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三 編

林 慶 彰 主編

第 24 冊

湘學與晚清學術思潮之轉變

黃 聖 旻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湘學與晚清學術思潮之轉變／黃聖旻 著——初版——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民98〕

目 4+186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編：第24冊）

ISBN：978-986-6528-94-1（精裝）

1. 學術思想 2. 清代哲學 3. 晚清史

127

98001757

ISBN - 978-986-6528-94-1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 編 第二四冊

ISBN：978-986-6528-94-1

湘學與晚清學術思潮之轉變

作 者 黃聖旻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09 年 3 月

定 價 三編 28 冊（精裝）新台幣 4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湘學與晚清學術思潮之轉變

黃聖旻 著

作者簡介

黃聖旻，臺灣省臺南縣人，1969年生，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國立成功大學中文學士。

目前擔任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專任副教授，曾任教於國立成功大學、國立空中大學、實踐大學（高雄校區）、和春技術學院、東方技術學院、樹人醫專等校。

師事宋鼎宗教授，著有博士論文《湘學與晚清學術思潮之轉變》，碩士論文《王先謙荀子集解研究》（收於《古典文獻研究輯刊·二編·第14冊》。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出版，2006年3月）。單篇論文〈屈原的伊卡羅斯情結〉、〈略論敦煌的結社活動〉、〈秩序情結與荀韓關係〉、〈論荀學的兩度黑暗期〉、〈湘學與晚清學術思潮的轉變〉、〈漢元帝所用非醇儒論〉、〈荀子注通假字研究〉、〈光影交戾的多重鏡相——論《古都》的存在意識〉、〈山水畫的形神理論〉、〈論船山詩論中的「勢」〉、〈清學對中國學術的承繼與超軼〉等。

提 要

本論文的理論建構基礎，是在深信學術有一內在理路的發展下，檢驗晚清學術的變化所得致的結論，並蒐羅學術資料，以證明湘學與晚清學術內在理路脫軌之間的關聯。

然而湘學一個地方學派何以對清代學術觀念的轉變，竟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呢？為分析此一現象，本文的進行方式如下：

第一章是前言，其中首要說明的是文章的題旨及動機，其次則是路徑，以便解釋所採行的研究方法以及章節的概要。

第二章主旨在析論清代學術的內涵。學術實為一有機體，有其內在需求所衍生的理路必須遵循，其特質的呈現亦自必與此需求的滿足息息相關。因而本章第一節的處理，旨在呈現此一研究成果。第二節筆者選擇自中國學術流變的三大動因，追索湘學何以能在此學術氛圍中發揮影響的原因。中國學術發展迄清，變因十分繁瑣。除與內在理路的需求相關外，清代學術所呈現的在地化特色，也是影響清代學術由魯、吳、皖、浙、揚、湘、粵各地學術輪番繼起掄元的主因；而學術中以禮改革的傳統，更是何以清學終世都不曾跳脫治禮需求的因素。故而敘述此三大動因，將有助於釐清湘學躋身影響清代學術的現象。

第三章是敘述湘學的在地化特質。根據筆者追索的結果，發現湘學的前身受南學與理學的影響，因而第一節中，筆者先敘述南學的形成及其學術特質。第二節則追索南學特質在落實於湘地學術中時，是透過什麼方式深化的，被強固的特質又為何。第三節，筆者將根據前二節的探索，抽繹出湘學的三大在地化特質：一是偏重形下的義理學風、二是堂廡特大的學術形態，三則是禮學的時務傳統。此三大特質與清學形成激盪之後，將對清代學術形成深遠的影響。

第四章討論清代湘學的轉變。在地化的學術在面臨時空轉捩的情形下，本就有偏移的可能。因而第一節中談及清乾嘉年間盛行的樸學，是如何使善於兼賅的湘學選擇融會並蓄。也開啟了湘學對考據學的認識。第二節則是論述清中葉興起的經世之學，使湘學因本身特重時務傳統的特質，而崛起為經世學風風雲會聚之處。第三節處理清中葉的崇禮思想是如何挑起漢宋爭隙，於是本有禮學傳統又擅長兼容並蓄的湘學因而選擇「以禮調和漢宋」的主張，也自此轉向了晚清學術的內在理路。

第五章則反向探索清代湘學對晚清學術思潮轉變的影響，重點在呈現兩方面：一是在經世學風的影響下，湘地學者如何接軌此一學風，而湘學學者又如何因自身的雜糅特質以致在變古與復古思潮間矛盾地擺蕩，於是形成第一節「在變古與復古間的取捨」；其次又注意到湘學的兼容並蓄畢竟仍是受限於自身特質形成的好尚，以致在西學的引進上也出現擁抱技藝科學，但卻排斥以中學揉雜西學的現象，因而論述第二節「在西學的引進與排斥間取捨」的內容。

第六章則是結論。總結上述章節，並論證整個晚清歷史上風起雲湧的變革，實與湘學有著至深至切的關係。



目次

第一章 前言	1
第一節 緣起	1
第二節 路徑	3
第二章 清代學術概論	5
第一節 清學對前代學術的承繼與超軼	5
一、清學承繼的內在理路與其純粹學術性的特質	6
二、清學超軼的專業學術及其人材分流化的生態	13
三、清學欲建立之新義理	17
第二節 清學研究的三條脈絡	21
一、自「學術自我流行的出路」鳥瞰清學的必然性	23
二、以「學術流布的在地化現象」審視清學生態	26
三、就「以禮改革的傳統」觀察清學議禮的凸出	30
四、小結	37
第三章 學術在地化與湘學特質	39
第一節 學術在地化的開端——南學	39
一、南學的出現	40
(一) 荊州新學	40
(二) 正始玄學	42
(三) 南學的正式成形	43
二、南學的特色	44
(一) 偏重義理的學術性格	44
(二) 雜糅的學術形態	46
三、小結	48
第二節 「派中之派出焉」——南學與湘學	48
一、周敦頤與南學	49
二、胡安國與湖湘文化	53
三、理學與湖湘學派	57
四、小結	65
第三節 湘學的基本特質	66
一、偏重形下的義理學風	66

(一) 湘學緣用求體的學風	66
(二) 湘學形下義理入清的發展	68
二、門庭開闊的學術形態	70
(一) 湖湘學派的廣博精神	71
(二) 書院教育的駁雜特質	72
三、特重禮學的時務傳統	75
(一) 湖湘學派的實效禮學	76
(二) 朱熹對禮學的重視	78
四、小 結	80
第四章 清代學術對湘學的影響	81
第一節 樸學風潮對湘學的轉化	81
一、樸學在清代湘地的流行	81
(一) 李文炤的振興學風	82
(二) 湘地的樸學大家	83
二、湘學雜糅樸學後的新貌	87
(一) 漢宋兼采的流行家法	88
(二) 形下致用的時務學風	92
三、小 結	94
第二節 經世學風在湘地的興盛	94
一、道咸年間湘地早期的經世思想	95
(一) 湘地封疆大吏的實踐	95
(二) 魏源的經世思想	99
二、洋務運動時期的經世思想	101
(一) 太平天國與洋務運動	101
(二) 曾國藩的經世思想與湘學	104
三、湘地經世思潮的影響	109
(一) 魏源經世思想對湘學的影響	109
(二) 曾國藩經世思想對湘學的影響	110
四、小 結	111
第三節 漢宋之爭與湘學的回應	111
一、漢宋之爭	112
(一) 顧炎武的通經致用說	112
(二) 《漢學師承記》與《漢學商兌》	114
(三) 凌廷堪「以禮代理」的主張	115
二、崇禮思想與湘學的回應	119
(一) 崇禮思想與「以禮調和漢宋」說	119

1. 曾國藩與凌廷堪禮學思想的比較	119
2. 曾國藩「以禮調和漢宋」的主張	122
(二)「以禮調和漢宋」說的定位	126
1. 「以禮調和漢宋」說的錯誤	126
2. 「以禮調和漢宋」說對湘學的影響	129
三、小 結	131
第五章 湘學對晚清學術思潮的影響	133
第一節 在變古與復古間的取捨	133
一、湘學對變古思想的提倡	134
(一) 古文經學的通經致用主張	134
(二) 經世學風下提倡變古的湘地學者	135
二、湘學對復古思想的執著	138
(一) 從內在理路看復古精神	138
(二) 提倡復古的湘地學者	140
三、對清學的影響	143
四、小 結	145
第二節 在西學引進與排斥間取捨	146
一、湘學對實效可行的西學之引進	146
(一) 西學在晚清的流布情形	146
(二) 湘地對西學的採納	149
二、湘學對雜糅西教的中學之排斥	150
(一) 湘地對新學態度的分裂	150
(二) 湘學內部對立的原因	151
三、對清學的影響	153
四、小 結	155
第六章 結論——一條未竟之路	157
附 錄	161
附錄一：皇朝經世文編系列學術（文教）卷之比較	161
附錄二：賀版、葛版、盛版《經世文》禮學卷之比較	163
主要參考書目	183

第一章 前 言

第一節 緣 起

首先要指出的是本文的撰述動機，是因為討論有關清代考據學形成原因的文章很多，近來也有不少學者提及清代義理學的存在，但是考據學的興起與清代義理學之間卻往往被切割來處理。而事實上，如果二千年學術真的可被視作是一有機質，有其內在理路存在的話，清代考據顯然應是建立義理學之前的必要演進。基於這個想法，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建立在考據之上的清代義理學為何？考據學如何能建立義理？以及何以今日看來，清代義理學，也就是清代學術在中國學術內在理路中的任務，似乎尚未完成，當中轉折的原因又何在？這些問題的思索過程，就形成了筆者這本博士論文的內容。

論文命題為《湘學與晚清學術思潮之轉變》，這種探討方式無疑必得面對定義及斷代的問題，因此，在進入本文之前，筆者想先就湘學的義界並其中的斷限加以說明。此處探討的既然是地域與學術的關聯，故而所謂的「湘學」，並非一般認知的，由曾國藩所代表的「湘黔學派」，而是泛指湖南諸儒身上的基本特質；所謂晚清，則是依費正清《劍橋中國晚清史》的界定，指由西元1800年始迄1911年，這百餘年的期間。根據這兩個前提，筆者將在以下諸章中探討湘學的特質，以及其與清季學風大方向轉變上的關係。此外，既名為《湘學與晚清學術思潮之轉變》，本文待決的問題，自不僅是湘學本身特質的剖析，這一切，更需扣緊在清學的範疇內談，也就是透顯湘學在清學史上的定位，如此一來，清學的界定便成了題旨中迫切需要交待的前提，並影響到

文章本身的路徑。

一般在研究清學時，往往針對清學興起的幾個要素如梁啟超所主張的「理學反動說」〔註1〕、侯外廬等大陸學者所主張的「社會經濟變遷說」，〔註2〕及由錢穆提點、余英時加以抉發的「內在理路說」〔註3〕三個最著名的理論一一進行檢驗、補充或質疑，這種研究法雖是以破為立，但對於清代學術的價值便鮮能觸及了；也有學者甚或僅以考證學的「有功於後學」、「最便於學者」來論斷清學的成就。殊不知乾嘉考證學真正躍為學術主流大約是只在惠棟的標識漢學至江藩成《漢學師承記》之間，之後宋學學術界就進行針對考證學開啓了綿密地批判、檢討的論辨。而且這個批判也並非始於宋學，漢學家於內部的自省，迺更萌發於前。如凌廷堪便曾批評當時考據學者是「挾許慎一編，置九經而不習；憶《說文》數字，改六籍而不疑。」，〔註4〕這時天理教尚未起事，更別提鴉片戰爭或太平天國了。與學者一般認定乾嘉學風衰落與經世學風復起是密不可分的看法，尚早了一甲子。

因此筆者認為，就在江藩《師承記》前，必有一雖是乾嘉遺風，但亟欲自立於考據學之外，而且是與漢學別立面目、欲自立一清代學術的思潮存在其間。故而追溯此一思潮的面目及何以未完成的因素，便成為本論文立論的根源，經過複雜的文本抽繹及反覆思辨下，筆者確信了此一完全自得的清代學術之存在，同時也發現，此一清代義理學之所以不行於世的理由，實與湘學有密不可分的關聯，故而將筆者所資文本，以及思辨過程，呈現於以下章節中。

〔註1〕此說以梁啟超先生為代表：「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簡單言之，則對於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頁6）

〔註2〕此說如侯外廬先生以為，市民階層的崛起，使得明清之際啟蒙學者的思想「別開生面」，「表現出對資本主義世界的絕對要求。」（侯外廬：《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史·第一章》，頁）；也有以為異族統治及高壓箝制才是使學術風氣迥異的主要因素，如章太炎：「家有智慧，大湊於說經，亦以紓死。」（章太炎：《煇書·清儒第十二》，頁22。）

〔註3〕此說如錢穆先生指出：「言漢學淵源者必溯諸晚明諸遺老。」（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1），其門生余英時先生對此則有更進一步的闡述：「我稱之為內在的理路（inner logic），也就是每一個特定的思想傳統本身都有一套問題，需要不斷的解決……從宋明理學到清代經學這一階段的儒學發展史也正可以這樣來處理。」（余英時：《歷史與思想》，頁124～125）

〔註4〕凌廷堪：〈與胡敬仲書〉，收於《校禮堂文集》卷二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2月）頁205。

第二節 路 徑

前節已述及，本文的撰寫，大抵在確定此一完全自得的清代學術之存在，同時也發現，此一清代義理學之所以不行於世的理由，實與湘學有密不可分的關聯，因而本文的研究路徑，取決於呈現學術流變轉折所必須的幾個斷面，其中包括學術流變的內在理路，區域學術內部體系的構架，以及時空環境的扭差，所以，本文的研究路徑，便依據這三方面來進行。

因此，本文的進行方式如下。

第一章是前言，其中首要說明的是文章的題旨及動機，其次則是路徑，以便解釋所採行的研究方法以及章節的概要。

第二章主旨在析論清代學術的內涵。欲剖析此一命題，必須自兩方面入手，一是清代學術的定位，一是清代學術特質。

在定位方面，筆者的著眼點，首在於釐清成見。我們知道，當前的學術界，是由自戊戌、五四以降的學運份子的支裔形成中堅。因此，在熟讀梁氏《清代學術概論》的學者眼中，往往只知有公羊、西潮，而不知有國粹、復古；只知有康、梁、譚、夏，而不知有清一代，學界實是人材輩出；甚者將清儒並目為陳腐守舊，無足觀也。以致迄今多本清代學術思想史的論述中，自戴震以後竟無一翻脫梁啟超的品題，彷彿除了今文家所激動的清初幾位先生及公羊家本身外，清代的知識份子便全無足道也。今日欲深入研究清學，此一膜翳是務必先行剪除的障礙。在特質方面，前節已述，筆者堅信學術實是一有機體，有其內在需求所衍生的理路必須遵循。既是由內在理路逼衍而出，其特質的呈現自必與此需求的滿足是息息相關的，因而本章第一節的處理，旨在呈現此一成果。第二節筆者選擇自中國學術流變的三大動因，追索湘學何以能在此學術氛圍中發揮影響，實應與清代學術本身的脈絡有關。中國學術迄清，已有繁瑣的變因存在其中：當中的變因除了與內在理路的需求相關外，清代學術呈現各省各地的在地化特色，也是影響清代學術由魯、吳、皖、浙、揚、湘、粵各地學術輪番繼起掄元的主因；而學術中以禮改革的傳統，更是何以清學終世都不曾跳脫治禮需求的因素。故而敘述此三大動因，將有助於釐清湘學躋身影響清代學術的現象。

第三章是敘述湘學的在地化特質。

根據筆者追索的結果，發現湘學的前身受南學與理學的影響，因而第一節中，筆者先敘述南學的形成及其學術特質。第二節則追索南學特質在落實

於湘地學術中時，是透過什麼方式深化的，被強固的特質又為何。第三節，筆者將根據前二節的探索，抽繹出湘學的三大在地化特質：一是偏重形下的義理學風、二是堂廡特大的學術形態，三則是禮學的時務傳統。此三大特質與清學形成激盪之後，將對清代學術形成深遠的影響。

第四章將討論清代學術對湘學的影響。

在地化的學術在面臨時空轉捩的情形下，本就有移轉的可能。因而本章第一節談及清乾嘉年間盛行的樸學，雖不同於湘學本身特重義理的學風，但是處在此氛圍之下，善於兼賅的湘學仍然選擇融會並蓄。也開啓了湘學對考據學的認識。第二節則是論述清中葉所興起的經世之學，因湘學本身便有特重時務傳統的情形下，很快地甚至崛起為經世學風風雲會聚之處。第三節論及清中葉的崇禮思想是如何挑起漢宋爭隙，因而本有禮學特質又擅長兼容並蓄的湘學選擇「以禮調和漢宋」的主張，也自此阻滯了清學的發展。

第五章則反向探索清代湘學對晚清學術思潮轉變的影響，重點在呈現兩方面：一是在經世學風的影響下，湘地學者如何接軌此一學風，而湘學學者又如何因自身的雜糅特質以致在變古與復古思潮間矛盾地擺盪，於是形成第一節「在復古與變古的取舍」的內容；其次又注意到注意湘學的兼容並蓄畢竟仍是受限於自身特質形成的好尚，以致在西學的引進上也出現擁抱技藝科學，但卻排斥以中學揉雜西學的現象，因而論述第二節「對西學的引進與排斥」。

第六章則是結論。

第二章 清代學術概論

第一節 清學對前代學術的承繼與超軼

首先，吾人所必須確立的觀念，在於今日的研究，並非為彌補近三百年中國所經歷的巨變及傷痕，否則一切研究將因此陷入忿仇悼亡的窠臼而不自知。今日研究近三百年學術史的最主要目的，當在尋求眼下學術的定位與方向，釐清了過往，才能明白這一路學術迤邐的軌跡前進的方向。正如唐君毅先生曾指出的：

蓋此由承繼以超軼，以超軼為承繼，正為儒學發展之常軌，是治中國儒學之思想史者，所不可不深察而詳論者也。（註1）

這種「常軌」並非尊崇韋伯的學者所認定的「停滯」，或是 *change within tradition*（在傳統內改變），而是有其內部規律與發展的。也許這三百年的巨變的確擾亂了固有學術的方向，但除非儒學覆滅，否則承繼此一內部規律並加以超軼，便是吾輩必得面對的課題。

談「承繼」、談「超軼」，便必須先正視清學在儒學史上的正面價值，才有承繼與超軼的必要。不同於以往面對清代學術所採取的完全否定態度，（註2）

〔註1〕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0年5月出版。）頁283。

〔註2〕 如牟宗三先生於《中國哲學十九講》中，認為：「明亡以後，經過乾嘉年間，一直到民國以來的思潮，處處令人喪氣，因為中國哲學早已消失了。」「這三百年間的學問我們簡直不願講，看了令人討厭。」（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年12月初版四刷），頁418。

歷經百年動盪，吾人已經能較持平地面對。然而歷史的傷痕太深，使得許多學者無法更清朗直視浩卷繁帙的史料中所呈現的真相，檢討苛責之語在諸本學術史、思想史中俯拾可見，往往忽視了清學在學術史的脈絡上自有其意義存在。也因此，尋繹清學在中國儒學思想史上的定位，並透顯今日儒學史的承繼方向，恐必為當務之急。

一、清學承繼的內在理路與其純粹學術性的特質

一般而言，有關清代學術興起的說法，最為主流者有三，即「理學反動說」〔註3〕、「社會經濟變遷說」〔註4〕及「內在理路說」，〔註5〕其中「內在理路說」因為是較後起的說法，〔註6〕修正意見不在少數，〔註7〕但都只是企

〔註3〕此說以梁啟超先生為代表：「清代思潮果何物邪？簡單言之，則對於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頁6）

〔註4〕此說如侯外廬先生以為，市民階層的崛起，使得明清之際啟蒙學者的思想「別開生面」，「表現出對資本主義世界的絕對要求。」（侯外廬：《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史·第一章》，頁）；也有以為異族統治及高壓箝制才是使學術風氣迥異的主要因素，如章太炎：「家有智慧，大湊於說經，亦以紓死。」（章太炎：《煇書·清儒第十二》，頁22。）

〔註5〕此說如錢穆先生指出：「言漢學淵源者必溯諸晚明諸遺老。」（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1），其門生余英時先生對此則有更進一步的闡述：「我稱之為內在的理路（inner logic），也就是每一個特定的思想傳統本身都有一套問題，需要不斷的解決……從宋明理學到清代經學這一階段的儒學發展史也正可以這樣來處理。」（余英時：《歷史與思想》，頁124～125）

〔註6〕余英時先生認為這種學說是對前述兩種「由外緣來解釋學術思想的演變」（余英時：《歷史與思想》，頁124）的修正。其始是錢穆先生於《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闡述，而余英時先生則於《歷史與思想》中加以濬發，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也有〈清代道學之繼續〉一章提點漢宋並非涇渭分明的，證明「清儒的博雅考訂之學也有其宋明淵源可尋」（余英時：《歷史與思想》，頁88）。

〔註7〕如林聰舜先生在《明清之際儒家思想的變遷與發展》中一一批判余氏的立基點之後，更另外提出了一種修正性的看法：「因為學術研究自主的發展過程，以及經學內部本就存在有種種困難的問題待解決，所以在經史之學的地位特別膨脹的情況下，學者在不自覺中逸出經世致用的範圍，由「通經」而通向「考文」、「知音」是必然的趨勢。再加上顧亭林承續明代中葉以後的考證學成就，以及自覺的努力，完全著重客觀的經史考證的乾嘉漢學遂繼踵而興。」（見《明清之際儒家思想的變遷與發展》（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年10月初版，頁309）；何冠彪先生的《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研究》也曾針對了「內在理路說」中的另一條證據加以批駁，他深入原典，發現羅整菴的「學而不取證於經書，一切師心自用，未有不自信者也。」絕非是「義理是非必須取證於經學」的意涵：「誠如錢穆和余英時指出，理學家取證於經典乃為自己的門戶所持的義理而爭

圖修正余氏「內在理路說」的單一、武斷處，而非是企圖否定「內在理路」的存在；故而學者雖各持己見，然而由宋學的義理轉向清學的實證性格，其間存有學術上的脈絡可尋，這個觀念已經成為近來學界的共識了。

如此一來，若果我們承認了清學的出現確實在學術史上有其內在理路的必然性，那麼乾嘉學術蔚為顯學，形成「家有智慧，大湊于說經。」〔註8〕甚至壓倒朝廷官學的現象，其實卻也證明了此一路線對儒學史而言，有其必要的價值存在，否則布衣學者不仕〔註9〕、封疆大吏主持考證而不事程朱官學，〔註10〕所為為何？正因為此一工夫，卻是儒學史上的必然演化！是以不論高官、布衣，都相繼投入此一考據風潮而不返，就連理學後裔亦不能免者，實是其來有自。余英時先生便指出：

六百年的宋、明理學傳統在清代並沒有忽然失蹤，而是逐漸地溶化在經史考證之中了……少數傑出之士，認真地提倡朱學或陸學……也都採用了「道問學」的方式……著作雖仍不免有門戶之見，但較之以前王陽明的「朱子晚年定論」和陳建的「學蔀通辨」要客觀多了，也謹嚴多了。〔註11〕

辯，他們取證的經典往往有意無意之間受其理學背景支配。所以義理之學雖折入考據，卻毫無以經學取代理學的意味……總括來說，顧炎武通經的動機和明代理學家求證於經的目的大相逕庭。……總之，自明中葉以後，因義理之爭而折入考證及以經學代管理學的主張成為兩股潮流，並進同趨，匯合而成乾嘉考據學。」（收於何冠彪：《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12月初版），頁282）；張麗珠女士的《清代義理學新貌》則雖然認為有內在理路，卻對於動因有不同的意見：「長期以來，學術發展一直都專注、偏頗在個人道德心性之學術範疇、形上思辨之學術型態一方面時，則另外一部份未被充份開發的領域，例如以社會大眾為關懷重點的社會哲學範疇、或是講尚證據的實證主義等，就在適當的時機……歷史條件都成熟了的時候，出來領導解決當時所已經無法解決的時代課題；並進而取代先前學術在學界中的領導地位，而成為新學術典範，領一代學術之風騷。」（收於《清代義理學新貌·緒論》（臺北：里仁書局，2000年），頁36。）。然而上述三位的意見卻都不是為否定內在理路的存在而發，而是針對內在理路的動因進行修正。

〔註8〕章太炎：〈清儒〉，收於《煊書·第十二》（臺北：世界書局，1987年3月三版），頁22。

〔註9〕如吳派惠棟、沈彤、余蕭客，皖派戴震等，皆戮力於經史考證的工夫，而以布衣終身。

〔註10〕如錢大昕、阮元等，雖是經由程朱學科考出身，然而不論主持修纂，抑或個人的學術成就，大抵都是側重漢學。

〔註11〕余英時：〈新代思想史的一個解釋〉，收於《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公

雖然主張是「尊德性」層次的問題，卻也不得不用「道問學」的方式來取信服人，更顯示此一趨向是整個儒學界在進化上的需求，而絕非是一種「逆轉」，否則如何能造成風行草偃的潮流，以至於「在考證運動興起之後，沒有嚴肅的學者敢撇開證據而空言義理了。」〔註12〕的現象？

事實上，儒學發展的常軌，正在「由承繼以超軼，以超軼為承繼」的軌徑上；宋學與清學間的此消彼長，也正肇因於後者對前者的「承繼」與「超軼」，這是儒學的進化。一旦承認二者間的內在理路是存在的，緊接而來的問題是，清學究竟是如何「承繼」、「超軼」理學的？要解決這個問題，則必須先了解清學的特質。余英時先生曾指出：

如果我們把宋代看成「尊德性」與「道問學」並重的時代，明代是以「尊德性」為主導的時代，那麼清代則可以說是「道問學」獨霸的時代。〔註13〕

余氏的分野主要是以學術態度來區分，當「道問學」的態度落實在治學方法上，則產生了「回向原典」〔註14〕、「取證於經書」〔註15〕的現象，而且這是「在尊德性與道問學兩派爭執不決的情形下，儒學發展的必然歸趨」，「即義理的是非取決於經典」。〔註16〕今日對此一現象描述，學界大抵並無疑義。〔註17〕

司，1992年），頁153。

〔註12〕余英時：〈新代思想史的一個解釋〉，收於《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2年），頁153。

〔註13〕余英時：〈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收於《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年），頁411。

〔註14〕余英時：〈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收於《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年），頁413。

〔註15〕余英時：〈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收於《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年），頁413。

〔註16〕余英時：〈由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收於《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2年），頁106。

〔註17〕儘管後來的研究者屢屢批駁他所指陳的「明代理學內部的爭辯不可避免地要逼出清代的經學考證」、「只有回到經典始能『定』程朱陸王之『諍』。」（余英時：〈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收於《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年，頁414）的觀點「並不能得到有力的佐證」（林聰舜：〈明清之際儒家新思潮興起背景的檢討〉一節，收於《明清之際儒家思想的變遷與發展》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年10月初版，頁304）、「有縱向解釋過於單一化之嫌，而忽略了橫向的時空之背景」（李紀祥：《明末清初儒學之發展》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12月初版，頁281），但那也只是在溯源的方面，至於現象觀察則並無異議。

既然「回向原典」、「取證於經書」的特質是由儒學的內在理路所逼出，這迥異於宋學的考證特質當能使新義理「承繼」前朝未竟之路（如朱陸之爭）而企圖加以解決，也必須能使新義理藉此考證特質「超軼」前朝學術（理學）而建立新生的內容，如此一來追索內在理路的脈絡才有其意義。然而姑且不論「軼出考證學範圍以外」（註18）的戴震，其欲建設的「戴氏哲學」竟然被視為是「情感哲學」（註19）！焦循頗受注目的「即利即義」（註20）、「各行其恕」（註21）的思想中，一樣也察覺不出考證特質在清代義理學建立上應扮演的角色。阮元以「相人偶」（註22）釋「仁」的觀點，則是少數明確可見、藉由考證學發揮建立新義理作用的例子。可見今日學者對乾嘉學者的義理學其內容的認知，似乎就只能看見對「理學」反動的影子，內在理路的痕跡反而被模糊掉，見不出「回向原典」、「取證於經書」的特質對清代義理學建立的影響。

對於這個現象，學者的解釋認為是乾嘉學者的義理學延續了明末學術界流行的氣論，（註23）所以呈現出社會哲學的特徵。然而筆者仍然堅信，在「回向原典」、「取證於經書」的內在理路影響下，義理學當是要呈現出更嚴謹的實證性格才對，但是「情感哲學」、肯定人欲等今日所認為的乾嘉義理學內容

〔註18〕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與《中國三百年學術史》合刊（臺北：里仁書局，1995年2月），頁35。

〔註19〕原文為：「綜其（《孟子字義疏證》）內容，不外欲以『情感哲學』代『理性哲學』」，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與《中國三百年學術史》合刊（臺北：里仁書局，1995年2月），頁38。

〔註20〕原文為：「小人利而後可義，君子以利天下為義……利在天下，即利即義也。」見焦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解》，收於《雕菰集》卷九（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9月），頁137。

〔註21〕原文為：「各行其恕，自相讓而不相爭，相愛而不相害，平天下所以在絜矩之道也。」見焦循：《格物解二》，收於《雕菰集》卷九（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9月），頁131。

〔註22〕原文為：「以此一人與彼一人『相人偶』，而盡其敬禮忠恕之事。」見阮元：《論語論仁論》，收於《桴經室一集》卷八（臺北：臺商務印書館，1968年3月）頁157。

〔註23〕如葛榮晉便認為「乾嘉學者……針對宋儒的『虛理論』，繼承與發揮明清時期的氣本論思想，大力提倡元氣實體論。」，見氏編：《中國實學思想史·中冊》（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9月），頁655。周昌龍在〈戴震義理學中情欲之社會基礎與驗證〉一文也指出：「他承接明中葉以來正面審視人之情欲問題的趨勢，結合清代事求是的學風。……營構出一種傾向於社會哲學的義理學。」收於林慶彰、張壽安主編：《乾嘉學者的義理學·上冊》，頁339～340。